目前的中东剧变源自独特的“阿拉伯病”。历史上阿拉伯、印度、波斯、中华并称人类四大古老文明,如今中国、印度、伊朗已先后摆脱历史阴影,走在民族复兴自强的道路上,而阿拉伯世界仍停滞不前,被世界经济全球化远远地抛在后面。政治上,阿拉伯国家仍然沿袭家族统治、个人独裁、君主世袭、子承父业,几十年保持一成不变的统治模式;经济上,结构畸形、体制僵化、政府巨额补贴,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日趋边缘化;外交上,饱受屈辱,22个阿拉伯国家敌不过一个小小的以色列,频频遭受西方双重标准和武力干涉及民主化改造的羞辱。“9• 11事件”后,美国全球反恐更是把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妖魔化。阿拉伯世界社会问题成堆,分配严重不公,人口快速增长,青年失业率奇高(30% – 50%)。阿拉伯世界的残酷现实使阿拉伯精英痛心疾首,纷纷呼吁新的“复兴运动”。阿盟秘书长穆萨就曾疾呼:“不变革的阿拉伯世界没有任何希望。”

目前正在进行的中东变局可视为阿拉伯国家迷茫屈辱、绝望情绪长期淤积的一次总爆发。它的发生虽有外部力量刺激和助推(如网络新技术、金融危机、美“中东民主计划”等),但具有相当的必然性,从根本上说是阿拉伯社会内在矛盾累积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这次剧变主要在阿拉伯世界范围,世界其他地区虽也会受到一些波及,但属“借风扬土”,性质不可同日而语。○

中东乱局的成因及其影响*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0年 12月,突尼斯一个年轻小贩因不满警察扣押自焚于当地县政府门前,此事经社交网站“脸谱”传播后,立刻激起突尼斯民愤,并最终导致激烈街头运动,致使总统下台。此后,中东地区多国相继爆发类似事件,特别是掌权埃及 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总统被迫下台更使整个阿拉伯世界为之一震。但由于事发突然,并且事态仍在进一步发展之中,所以不宜过早对局势做出结论。目前可以判断的只是引发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与发生在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不同,并非大国策划推动,而是国内人民自发的政治运动,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经济原因。事件发生国政府应对全球化不力,经济发展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值得注意的是,突尼斯、埃及 1978– 2008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 5.07%、4.52%,排名世界第 12和 19位。在这样的经济成就下依然爆发了激烈街头政治运动,说明其经济增长本身蕴含问题,即经济总量增长,但质量低下,所以遇到外部经济冲击便会陷入困境。加之发生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全球市场需求锐减,由此带来石油价格和旅游人数大幅下降,使得此次事件当事国普遍陷入经济困境。这说明,尽管曾经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但这些国家并未就应对全球化挑战做好准备,包括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增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等等。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没有使老百姓得到实惠,这是导致动乱的根本原因,而这又与这些国家的政治问题紧密相连。

第二,政治原因。此次事件发生国普遍具有半开放性特点,同时面临国内强人统治下的恶性腐败和国际社会干预的双重压力。此次被推翻下台的几个国家领导人都因长期统治而在国内积累了严重的家族腐败问题,由此导致经济增长成果无法惠及百姓,从而逐渐失去民心。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普遍具有半开放性特点,即对内施行强人统治,对外又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比如突尼斯就积极参与了法国推动的地中海联盟合作,埃及也是推动中东和平的重要国家。在此背景下,主导国际社会的西方价值观便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些国家的青年,增强其对本国强人政治的不满。另外,西方价值观中对于军

* 本文第二作者康晓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9级博士生。

队国家化的要求也成为对这些国家军队的一种无形监督。埃及军方在此次事件中保持中立而置国家动乱于不顾就是这种国际压力的典型体现。

第三,社会原因。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失业状况,使大量无业青年成为街头政治主力军。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贫富分化,这在积累社会矛盾的同时也降低了政府治理能力,使其一方面无法创造足够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也难以通过有效教育提升人口的就业能力。从理论上看,一个生物人要转变为有效劳动力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肯干精神,二是技术能力,三是团队合作精神。目前来看,阿拉伯年轻人普遍缺乏这三个条件,因此他们虽然人多,但无法形成强大劳动力,相反由于年轻气盛特别容易成为街头政治的导火索和主力军。

第四,技术原因,互联网迅速发展对矛盾激化和扩散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互联网对于此次中东变局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大大降低了社会动员成本,使社会成员自发而非有组织相互联系。在此过程中,互联网容易夸大仇恨和传递负面信息,最后使大家只关注几个网站而完全不顾官方媒体报道,因而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当然,这种技术因素起作用的前提是社会已经积累了深刻矛盾,所以社会成员,尤其是年轻人对政府缺乏信任,此时互联网如果散布反政府言论就特别容易起到夸大和扩散效应。当然,这也是突尼斯、埃及等国半开放政治体制导致的结果,即在国内施行强人统治的同时又对媒体监管不力,最后导致民怨集中爆发。

此次中东变局可以给中国带来如下一些启示:一是经济发展成果一定要惠及百姓。相对于阿拉伯国家,中国政府应对全球化的能力和成果都更加显著,这不仅表现在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上,更表现在中国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科学规划和及时战略转变上。中国目前已进入人均收入 4000美元的关键阶段,在国民财富总量增长的同时,如何公正分配财富的问题日益凸显,如何保证普通百姓能切实享受巨大的财富蛋糕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

二是必须高举反腐败和维护社会公正两面大旗。这是保证经济成果惠及百姓的基本前提。中国政府下一阶段应当重点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特别是在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领域,如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政府只有始终在反腐败和维护公正方面取得重大成效,才能使民众看到生活改善的希望,也才能使其保持对政府的信心。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就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工作所做的重要讲话正表明了党中央在这方面的坚定决心。如果能真正落实,那么必然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

三是必须有效应对大学生就业问题。此次突尼斯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学扩招过快导致严重失业问题,而这也正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目前的突出表现是收入与学历倒挂,一方面农民工工资迅速增长却出现“民工荒”,另一方面大学生工资止步不前甚至低于农民工。这种现象容易使大学生产生对社会和政府的怨恨。网上流传的话语“我用一麻袋的钱上大学,换了一麻袋书;毕业了,用这些书换钱,却买不起一个麻袋”,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在于产业结构升级,增加适应大学生和更高学历者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岗位供给,实现个人回报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四是对互联网要“管”不要“关”,用之所长,补之所短。此次中东变局的主要原因被普遍归于互联网,但互联网其实只是社会危机传播的途径而非症结,因此正确的态度应是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有效缓解甚至化解社会矛盾,切断互联网传播的危机之源,而不是本末倒置。互联网的确是人类现代化的一大成就,尽管在危机中有一些负面作用,但正常情况下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国家建设都已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北京奥运会境外火炬传递期间,正是清华大学学生主办的“反CNN”网站帮助中国缓解了国外媒体的肆意攻击,也正是在互联网传播下海外华人才迅速组织起保护火炬传递的活动。至于残疾女孩金晶勇于护卫火炬的事迹更是首先通过互联网迅速传遍全球。在此过程中,互联网已经起到增加中华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作用,帮助人们跳出地域限制,形成更广阔的国家视野。同时,互联网还可以使政府更好地关注百姓诉求。曾任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的马克西姆在其所著《最后的 70天》一书中写到,苏联的家庭妇女

在苏联解体前居然抱怨买不到手纸。对于一个能送卫星上天的国家来说,这绝不是能力不行,而是因为沟通不畅没有及时了解百姓诉求。因此,中国政府一定要利用媒体在平时积累信誉,危机时则抢抓发言权。具体对策包括:公共媒体要在第一时间抢发言权和解释权;解释一定要力求公正,以树立公信力;高级官员要利用互联网多与民众直接沟通,了解民众的真实需求。

此次中东变局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大致有如下方面:第一,欧洲国家受到的直接冲击较大,目前欧洲各国最担心的是难民潮,未来则意味着欧洲与北非国家的合作面临更多的困难;第二,阿拉伯国家近期的经济困难进一步突出,但如果在政治骚乱后其政治有所改良,则对其长期的现代化进程有好处;第三,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关注不得不有所加强。

中东乱局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主要是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有所损失,另外,由于油价高涨,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将面临更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但是,该事件的战略影响看来利大于弊。第一,中国政府在 12天内从利比亚撤出 35860名中国公民,显示了强大的行动能力和以民为本的外交理念,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第二,此次事件中未被推翻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可能会对美国不满,因为美国一直处于犹豫状态,并最后抛弃了阿拉伯盟友,比如穆巴拉克在下台后就拒听奥巴马电话,其资产则被瑞士银行冻结。第三,穆巴拉克之后的埃及目前处于军方、自由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宗教势力三方博弈状态,其中美国会助推前两者结合共压“穆斯林兄弟会”。但是,三方争取的对象都是动乱的主力军即埃及年轻人,其中“穆斯林兄弟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最大,所以选举若真能顺利举行,有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获胜。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最近撰文所言,革命之后最有可能胜利的恰是最有组织的力量。若此,中东便会出现埃及、伊朗两大反美国家联盟,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第四,如果埃及军方和自由派共压“穆斯林兄弟会”,那也将造成埃及局势进一步混乱,美国不得不分散精力维持其稳定,从而减少对东亚地区的战略投入。○

北非中东政局动荡归类分析

殷 罡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大体看,北非、中东国家发生的政局动荡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无外部势力直接介入的国内政治斗争,比如埃及和突尼斯。以埃及为例,穆巴拉克虽然不得人心,但在外部合作方面成绩突出,是美国的非北约盟友,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国际反恐斗争的干将,美国没有理由坐看他非程序性地被赶下台。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尽管对穆巴拉克恨之入骨,但没有能力煽动埃及民众造反。埃及变天是少数“4· 16运动”的青年人筹划的,手段极为高明。之所以得到举国响应、导致穆巴拉克最终下台,是因为穆巴拉克执政时间过长,其家族势力过于强盛,构成了对国民利益的剥夺。突尼斯的情况与埃及相同,本·阿里的毛病与穆巴拉克如出一辙。突尼斯和埃及的共同点还在于军人集团的支柱作用。伊斯兰极端势力长期受到打压,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已明显改弦更张,修正了原有立场,走上了合法的道路。因此,即便强势领导人垮台,也不至于导致国内混乱和伊斯兰势力扩张。此类国家的民主运动被西方认为是“安全的革命”。

第二类是得到外部势力支持并有地区力量角逐,比如巴林和也门。几乎所有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有不同比例的什叶派人口,尽管他们信奉的并不是伊朗国教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而是多为栽德派即第五伊玛目派,但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朗的影响。如也门的胡塞家族,公开表示要效仿伊朗体制,同黎巴嫩真主党没有本质差别。在巴林,占人口多数的